

俄罗斯优秀作家随笔丛书

知识分子 与革命

亚·勃洛克 ● 著
林精华 黄忠廉 ● 译

东方出版社

俄罗斯优秀作家随笔丛书

知识分子与革命

亚·勃洛克 ● 著
林精华 黄忠廉 ● 译
黄 玫 赵桂莲 ● 校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装帧设计:李颖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与革命/(俄)勃洛克著 林精华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0

俄罗斯优秀作家随笔丛书

ISBN 7-5060-1390-8

I. 知…

II. ①勃… ②林…

III. 随笔-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528 号

知识分子与革命

ZHISHIFENZI YU GEMING

(俄)勃洛克著

林精华等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160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5060-1390-8/Z·150 定价:13.80 元

勃洛克不可缺失的另一半形象

林 精 华

亚历山大·勃洛克(1880—1921)不只是一个诗人,同时还是一位重要的散文家。然而 20 世纪更多的只是把他当作诗人,对其著名诗篇《美女诗草》(1904)、《斯基福人》(1918)和长诗《十二个》(1918)等一直争论不断,迄今为止也没有形成基本的公论。

勃洛克的散文重要意义在于:其文学史地位不仅有一部分是靠散文来支撑的,许多重要篇章在当时就产生过重大反响,而且俄国文化史的丰满性缺少不了其散文的魅力、俄罗斯文学史的不少脉络得靠其散文来澄清、确证。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国文艺复兴时代,俄国文化界重要人物,无论其身份是诗人、小说家或是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宗教思想家,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扩展各自的思想、在公众文化空间树立自己的形象,无不打破文体创作领域的限制,通过最便捷的散文形式来发言,从经济思想史家、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谢尔盖·尼古拉耶夫·布尔加科夫(1871—1944)到激进的象征主义文学家安德列·别雷(1881—1934)等无不如此,而且当时学术界、文化界与思想界等重要知识分子人士在这个领域几乎都颇有建

树,因而促成一个时代的散文繁荣。勃洛克领时代风气之先,也吻合了这一潮流;作为后期象征主义者又延续了这一潮流。

勃洛克散文的重要性远不在于其许许多多篇章都可称得上是美文,更重要的是:诗人用散文的语言表述其对俄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的诗性思考,独具个性地展露了俄国白银时代文学家对19—20世纪之交的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宗教哲学思想、文学思潮和知识分子特性等重大问题的看法,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俄国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复杂心态,客观地表明了象征主义思潮发生的理论基础和生活事实根据。这些也正是理解《十二个》之类重要诗篇不可缺少的理论和基本依据。

也就是说,要理解勃洛克的诗篇、俄国象征主义思潮,要深入了解俄国知识分子特性和俄罗斯的特性,就不能不读勃洛克的散文。

读勃洛克的散文,首先是要认真品味《知识分子与革命》(1918)、《人民与知识分子》(1908)、《自然力与文化》(1908)、《“宗教探索”与人民》(1907)和《人文主义的毁灭》(1919)、《艺术与革命》(1919)等经典篇目。在那个缺乏现代信息传媒的时代,这些散文大多数首先都以报告形式让一部分人先睹为快,紧接着见诸当时发行量极大的文化报刊,因而轰动一时。众所周知,从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俄国文化讨论热潮不断:普列汉诺夫一系列著作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导致了民粹主义退潮、知识分子民族观念和民主意识的普遍成熟;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从宗教哲学角度阐释俄国文化危机

和欧洲文明危机,在理论上终结了俄国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关于俄国性的分歧,特别是在精神上动摇了俄国面向西方改革所形成的现实主义传统;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时,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著名长文《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和某些新流派的兴起》(1895)引发了俄国文化性质的争论,此后象征主义思潮波澜壮阔、检讨俄国现实主义思潮的做法蔚然成风;1905年革命事件后,格尔申宗和别尔嘉耶夫等人推出的《路标》文集,从文化理念上触动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意识和“知识分子特性”之认识,由此引发俄国革命的意义和知识分子向何处去等问题的论争;1917年二月革命后知识界普遍认为俄国此后告别了革命,然而事隔半年多的时间,流血的革命又取代了和平,导致“革命是否适宜”、“革命与文化”和“知识分子与革命”等涉及到身家性命的争论绵延不断。勃洛克作为当时著名的饱学之士(彼得堡大学校长的外孙、世界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的女婿),有条件熟知、有能力感受、有机会参与其中的某些论争,上述散文正是他最终参与的重要成果。他从人文主义变迁的历程感受俄国文化变革和社会制度革命的必然性、可能性,呼唤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理解革命;又从理想人文主义角度,质疑、悔恨甚至反对现实中的许多有悖于民族文化建设、破坏人文精神建构的革命行为。在娓娓道来或旁征博引中,这些篇章透出俄国知识分子的用心良苦。不仅如此,因其感受的细腻、思想的缜密、见解的深刻,因而获得可同《路标》派职业思想家相媲美的价值和与别尔嘉耶夫的力作《俄国共产主义的思想及起源》相当的意义。可见,只有读通

了这些篇目,方可在诗歌主旨上理解“革命”意象和“革命者”形象(《十二个》)、“文明世界”与“匈奴”部落的潜文本意义(《斯基福人》)。

勃洛克主要是作为文学家而立足于历史的,因而对当时文学界本身的情况、文学思潮的兴衰、对知识分子如何表达思想等问题自然而然极其敏感。当然,关心时代的文学状况也是其使命。在他本人事实上是一个象征主义者的情形下,是如何对待当时的文学主流——象征主义这一问题,自然成为众多人关心的事情;他又是很有影响的象征主义者,如何评述很尊重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同时代现实主义作家,是文坛关心的又一件事情。机会来了:著名的理论家伏亚契斯拉夫·伊凡诺夫(1866—1949)于1910年发表了重要论文《象征主义遗训》,引起了文学界内部激烈争论,勃留索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古米廖夫、安德列·别雷和勃洛克等重要人士都被卷入其中。这年的《金羊毛》和《阿波罗》杂志适时地组织了这次争论。勃洛克出手不凡,发表题为《关于俄国象征主义的现状》报告并很快被《阿波罗》杂志转载。从这个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预感到象征主义因其自身特征发生危机是必然的,并批评了身为其中的象征主义。这次争论之后,象征主义转变为阿克梅主义。接着,勃洛克又发表散文化的评论性论文《没有神性,没有灵感》(1918)。这两篇重要文献,在相当程度上显示出他对高尔基、安德列耶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等文学家的感情,既感受到现实主义的力量与矛盾,又发现象征主义的矛盾与力量。然而,诗人在理性上对象征主义理论复杂性和深

刻性的如此认识及其表述,并不是有意为之的,而是与其诗歌创作一致而自然天成的:勃洛克出版第4部诗集时,就引起了在象征主义诗学追求上比其极端得多的安德列·别雷的关注,后者认为他的诗与宗教探索时代是一致的,爱情主题交织着诺斯替教徒的宗教哲学主题和弗·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思想,其象征主义诗学显示出诗人内在的深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比勃留索夫、巴尔蒙特和维亚契斯拉夫·伊万诺夫更丰富,如同俄罗斯那样深邃;同时,他的诗篇又像其散文那样清新自然,拥有广泛的读者群。究其因,勃洛克非常本真地表达了他复杂深刻的俄罗斯母亲之情结,他热爱俄罗斯就如同热烈的爱情那样,因而你也要像满怀热烈爱情那样去热爱他的诗^①。如此一来,我们也就明白了勃洛克象征主义诗何以如此复杂却很有社会影响,进而自然也就不会再简单地对《十二个》下这等判断,即反映了诗人把十月革命比喻为伟大的宗教革命。

勃洛克的诗歌意象丰富得让人难以捉摸,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远不是他对象征主义诗学运用得多么惊险、奇特和复杂,而是他作为一个俄罗斯诗人,在象征主义诗歌创作中不断融入俄罗斯传统意识或文化经典意象。如何发掘并体悟其诗篇中的这类意象,就需要在其诗歌文本之外寻找本体论或认识论方面的支持。这么做不是因为诗人好用典,后人不得不“在诗外”下功夫,而是由于其个人博学和时代的文化复兴氛

① 安德列·别雷:《散文选》,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88年俄文版,第283—289页。

国,变成了其象征主义诗学的基础。由此,我们不能不注意他一组评述俄国经典作家的散文:《关于诗人的使命》(论普希金)、《书呆子论诗人》(论莱蒙托夫)、《果戈理的孩子》和《俄罗斯上空的太阳》(读列夫·托尔斯泰)等。这组散文的意义远不止是表明诗人表达对俄国经典作家的独到看法,更重要的是显示出他对待经典的特殊标准和独特的阅读方式。诗人以象征主义的视野审视俄国文化史,从而大大地扩展了文化经典意义的空间和通往这个空间的通道,并有可能使经典内化为创作中的诗歌意象,进而使其诗学凝聚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例如,在著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格·楚尔科夫看来,浪漫主义在勃洛克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勃洛克诗歌“与茹科夫斯基的浪漫主义沾亲带故,其爱情诗的主题有时候令人想起《夜之火》”^①。的确,俄国浪漫主义传统对其影响是巨大的:可望再现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看到非现实性因素(或相反)、追求某种神秘主义的信念等在其许多重要诗篇中都有反映。然而,又何止是茹科夫斯基的浪漫主义呢?巴拉丁斯基和普希金等非现实化的诗学主张、果戈理的宗教神秘主义理念等于他而言又何尝没有魅力呢?不过,我们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传统文化力量作为某种诗性在其诗歌中流淌,因为传统文化作为诗学意象已经被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和索洛古勃等老一代象征主义大师那含混而细致的诗学洗礼过,

^① 格·楚尔科夫:《雪姑娘》,载《金羊毛》杂志1908年第10期第51页。

而且又与以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为基础的心灵诗学发生了密切关系。后者对勃洛克来说极为重要,“除了缪斯这位真正的女老师之外,勃洛克的导师就是弗·索洛维约夫了。在最低限度上勃洛克最接近的是索洛维约夫:他们几乎一致地把世界灵魂神圣化了”^①。也就是说,勃洛克是通过19—20世纪之交的宗教哲学中介而重新审视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因而使得其诗学尽管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在其诗篇的字里行间和整个诗学结构上是超越经典意义上的浪漫主义的,进而导致其文本的表述方式符合诗歌传统规范、而文本的语义所指却超越语法结构。由此,如果不经由其这些散文的中介性阐释,是很难理清传统与现代在他身上的有机结合的。

读他的各种散文,我们明白了正因为经由这样的复杂中介,他不会简单明了地抒写《意外的喜悦》(1907)、《抒情悲剧》(1908)和《白雪假面具》(1907)等诗篇,也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真切的爱情体验(如《少年诗篇》和《美女诗草》等),因而以十月革命、知识分子命运和人文主义等为叙述对象的诗篇,更不会追求文字符号的能指与语义所指的对应。即使是叙述文化史上的公众人物普希金、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艺术家维拉·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和弗鲁别尔等,也因其独特的象征主义诗学基础,这些人物在他那儿有别于其他作者的叙述。

^① M. 霍夫曼:《论最近几年的俄罗斯诗人》,莫斯科“缪斯格特”出版社,1909年俄文版,第291页。并参见本书中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与我们的时代》一文。

勃洛克散文的重要性还在于建构了一个新的语言世界。诗人、文学评论家科·楚尔斯基在其力作《从契诃夫到我们的时代》(1908)中说:“勃洛克在俄语中找到了某种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的魔力,这是许多诗人没有猜出的普希金、费特和丘特切夫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新魔力”^①。后来,巴赫金进一步证实到:“勃洛克的语言近似于一种内部语言,就一般意义而言,其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②。这种语言的魅力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自由阅读空间,是特别需要读者而不仅仅是译者大书特书的。然而,这种空间给等效翻译带来了极大困难。在此,不能不对另一个译者和两位校对者表示感谢,而且在感谢的名单中还少不了给予我特殊帮助的周天璐女士和梁月怀先生(他们是在莫斯科的同学)、我的妻子曹雷雨女士和本书编辑张伟珍女士。

另外还要作一点说明:本文集选自《亚历山大·勃洛克2卷本文集》(2)(莫斯科国立艺术文学出版社1955年俄文版)。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只有译者的注解才做标注“译者注”,没有这种标示的则为作者和原编者的注释(并且不再作进一步区分)。

是为序。

2000年6月于莫斯科

① 转引自《勃洛克纪念特辑》,莫斯科Ren-Tv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第194页。

② 转引自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98年俄文版,第51页。

目 录

勃洛克不可缺失的另一半形象	林精华 (1)
书呆子论诗人	(1)
玫瑰栅栏姑娘和蚂蚁王	(8)
色彩和语言	(24)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	(31)
春天觉醒	(37)
俄罗斯上空的太阳	(41)
“宗教探索”与人民	(45)
人民与知识分子	(55)
讽刺	(63)
作家的灵魂	(70)
果戈理的孩子	(76)
自传	(82)
艺术的闪电	(98)
关于俄国象征主义的现状	(125)
答梅列日科夫斯基	(141)
被爱情遗忘的女人的日记	(146)

2 知识分子与革命

知识分子与革命	(156)
俄罗斯的纨绔子弟	(172)
人文主义的毁灭	(178)
纪念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	(204)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与我们的时代	(213)
关于诗人的使命	(220)
“没有神性,没有灵感”	(232)
自然力与文化	(246)
艺术与革命	(259)

书呆子论诗人*

莱蒙托夫是一位不太走运的作家。他著述不多,也没能赢得后人真正的爱戴。很多研究者都不太愿意研究莱蒙托夫,很多人没有能力来研究他。对于大众读者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莱蒙托夫曾经是(从某些方面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只会捻着胡须编故事的大兵而已。他的诗句“一块石头压在心头,于是渴望复仇”曾被认为是寻衅滋事和不良军人习气的代名词。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自然是有其深层的原因。原因之一是,透过众所周知的有色眼镜来看莱蒙托夫,只能作此解释。从这个观点看来,莱蒙托夫好像是一本卦书或者是令人着迷的牌戏,可以把他理解为于人无益、戕害人们心灵的“迷信”,或者是同样于人无益而且折磨人的“星期三”、“大满贯”(牌戏术语)。

只是在近几年来,许多文学流派开始重新趋向认同莱蒙托夫,把他作为本流派的创始人。人们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他的尊敬,有的炽烈,有的热情,有的无言,有的胆怯。丘特切夫

* 该文首次发表于1906年2月27日第396期《话语报》的《文学副刊》第4期上。

——俄罗斯最忧郁的诗之魂，与莱蒙托夫的声音遥相呼应。他的回声有些低沉，被同样的不朽压抑，受同样的秘密折磨。对于丘特切夫来说，莱蒙托夫的声音如此“可怕，仿佛童年的梦魇”，仿佛“关于创世之混沌的可怕的歌”^①。“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我们越来越经常听到这样有意识的表述，其实以前我们也多次这样说过，只不过是下意识的：“如果不是莱蒙托夫，就是普希金”或者相反。这两个充满魔力的词，这两个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人民自己的名字，成为俄罗斯文学界和俄罗斯神秘的现实中两个阵营的口号。仔细倾听这两个依然敌对的阵营的战斗话语，我们会越来越清晰地听到，谈论的是某种超乎生与死之上的事，是关于宇宙的混沌、关于把永远快乐无忧的卡尔莫尼娅^② 发配到充满罪恶、严寒的荒漠之地。卡尔莫尼娅是莱蒙托夫爱情的永恒象征。

人们嘴上越来越少这样说，心里却越来越经常这样想：莱蒙托夫和普希金是两个“先定”的人物，是俄罗斯生活和文学中的一个谜。关于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一些类似的话，他的话音已经沉寂，静静地长眠于心的一隅。关于莱蒙托夫还几乎没有任何话说，沉默，还是沉默。评论作家可能有两种方式。其一，创作批评，类似于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所做的批评；其二是无情解剖，这是外科医生常用的方法。在手术

① 引自丘特切夫的诗句。

② 卡尔莫尼娅是希腊神话中英雄卡德莫斯之妻。传说中，卡德莫斯是许多城市的缔造者。

过程中，他们除了面前横陈的这具病体，必须心无旁骛。

这第二种方式是所有文学“研究”的基础。这种方法就叫作“文学—历史研究法”。它对最细小的事进行最可怕的观察，如果不是说出了一些乍看一无所言，但实际上必不可少的赤裸裸的事实真象，研究者们仔细耐心的研究便真是一种对生活的犯罪。

运用这种方法的研究者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前景视而不见。他们所爱好的是僵死的骨架，不过这副骨架答应他们在未来要长上血肉。这就是砌石工所作的那种枯燥的粗活，他们在为沙皇的宫殿或者是民族艺术的宝库打着低矮的地基。

现在没有研究莱蒙托夫的土壤，因为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研究莱蒙托夫只能靠“领悟”他的作品。但他展示出的面孔阴郁、冷漠、令人不快。哪怕是聪明、敏锐，但无形可捕的猜测，也想要做得极其客观、公正，以免“惊扰亲爱的亡灵”。要挖掘埋在地下的珍宝，首先必须弄清藏宝图上指示埋藏地的暗号的涵义，然后还需几经精心测量，这之后方能一锹定位，正确挖开埋着珍宝的那块土地。莱蒙托夫这座宝藏值得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去挖掘。

我们在科特里亚列夫斯基教授所写的书的前言中读到这样的话：“该书的作者并不想对莱蒙托夫的创作做一个全面的评价（这是自然！）；他将全部注意力只集中到一个主导思想上，这思想涵盖了诗人全部的思考；只集中到一种主要情绪上，这情绪是诗人那始终如一的忧郁情调之源”。（第2页）

这已经有些使人兴味索然了：难道已经找到所谓的主导

思想和主要情绪了吗？那我们还在热切地企盼什么呢？

我们面前展开长长一列千人一面的评论文章，好像都是用中学语文教师，而且很有可能是女教师的口气写成的。你一边读一边惊诧不已：在我们这个异峰突起、崇尚运动的时代，这些千篇一律的评论从何而来？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能忍受这些“没有一点灵感火花”的评论，不要求哪怕一点点看得见的奔放、自由和一点点无论何种形式的创新？在长达300多页的书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句子能够引人思考，让人感觉到它不是把前几辈人的经验和思考重磨了上百次之后的产物。都是些老生常谈，以至于已经被写进中学教科书，而教科书，就其本质而言，只是“讲解”那些大多数人确定的，符合大多数人的理解的东西。

在此书的作家生平部分我们会了解到比《莱蒙托夫作品集》所附的作者简历稍微多一些、有时还少一些的信息，其中绝大部分篇幅用来谈“创作”问题。这里，在分析莱蒙托夫青年时期创作时，占主要地位的，是令科特里亚列夫斯基先生“惊奇的，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诗意的构思与其生活事实之间的不相符合”（第29页）。这里似乎没有任何值得惊讶的东西，而原因不言自明：莱蒙托夫是个诗人。但科特里亚列夫斯基先生如此陈述自己的理由：“忧郁的气质”，“单调闭塞的生活”，“极端追求自省”和倾向于“夸大自身的感觉”。总的说来，科特里亚列夫斯基先生不大相信莱蒙托夫本人的表现。如果相信的话，他很怀疑地说，那莱蒙托夫第一次陷入热恋时，他才10岁（第37页）。对于莱蒙托夫的激情，科特里亚列